

# 细民盛宴

张怡微 著

家族生活里永远没有沉思。

这个世界没有为我们准备多少快乐。

——  
细民  
盛宴

绑架民盛宴

张怡微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细民盛宴/张怡微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2009-3

I. ①细…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2005 号

责任编辑 文 珍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009-3

定 价 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序：怎一个愁字了得

王宏图

不知从哪一刻起，你置身于一间狭逼晦暗的小屋内，迷蒙不明。你徜徉良久，费力地辨识着前后左右的方位。突然间，一个声音响起来，开头带着几分生涩，磕磕碰碰，渐渐变得顺畅，娓娓道来。它的音调在冷冽的沉静中蕴含着几许淡淡的哀痛，闪烁出一簇簇奇异的光焰。起先你还是仅闻其声，不多久，一个年轻女孩抬起头来，清癯的脸容上挂着浅淡的微笑，而底子里萦回着一股子坚毅、决绝之气，毫不留情地扫视着尘世间的纷纷扰扰蝇营狗苟，而人性深处那众多令人困窘的卑鄙龌龊之处更是逃不过她有时显得过于犀利的目光——这是张怡微作品最初留给我的印象。

在众多才情横溢的文本中，张怡微源源不断地向人倾诉的并不是镀着异国情调光晕的传奇，不是心灵鸡汤般的励志故事，或是皆大欢喜的陈词滥调，她展现的是市井小民的平凡人生，人们像空气一般

对这些琐细的悲欢离合熟稔于心。但它们并不禀有田园诗的平和宁静,那些男男女女绷紧了神经,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世事的险恶,人心的无常,青春的焦灼与苦闷,悉数浓缩在字里行间,而家庭成员间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纠葛则成为回旋往复的主旋律。

远在十八世纪,面对一大群懵懂、心智未开的庸众,法国作家让-雅克·卢梭曾大声呼吁:“跳出童年时代吧,朋友,觉醒呵!”但对于张怡微笔下的少男少女,他们早已走出了纯真年代,躑躅在成人世界曲径遍布的迷宫中。尽管每一代人在青春期的躁动不安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对前辈人尊崇的价值、有意无意为后辈规划圈定的生活道路心生鄙夷不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陷入与父辈粘腻腻、欲说还休的对峙中。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幕幕冗长、憋闷的室内剧,几代人游走在这狭逼的空间中,面面相觑,好不自在,但又不能不将自己的耐心撑拉到极限,谁都没有勇气轻易推开大门,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那样奔突而出。这一主题在张怡微初登文坛的《我真的不想来》中已初露端倪,女孩罗清清在篇尾撕心裂肺地呼喊着,“我真的不想来/我一点也不想来”,这一痛快淋漓的爆发集中表现了一代人的心声:他们面对长辈无休止的纠缠威逼,已臻于忍无可忍的临界点。而在日后的《你所不知道的夜晚》《试验》以及近期发表的长篇新作《细民盛宴》中,这一主题得以进一步再现,并拓展、衍化出一系列变奏。

不难发现,罗清清等人陷入的是由细密的血缘关系织缀而成的巨大网络,他们自幼便浸润其间。它那么温情脉脉,为人们在陌生世

界的狂风骤雨中筑垒起了避难的巢穴。但它对他们又有一种致命的伤害,张怡微借罗清清之口,道出了它对后辈的束缚:“令她恶心的是这屋子本身,是那种亲密痴缠她的力量,多年来令她无法挣脱,无法遁逃。”在这里,没有独立的空间,没有个人喜好的自由,没有任心灵飞翔的天地——最重要的是没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追求自己人生价值的自由,一切都得看长辈喜怒无常的脸色行事,一切都得施展走钢丝的高难度动作,小心翼翼地保持身段的平衡,惟恐不经意间稍有闪失便重重地坠落而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成了一座装着看不见铁栏杆的牢狱,怪不得一个多世纪前法国作家纪德会在《地粮》中发出刻毒的诅咒:“家庭,我憎恨你们!”

触摸到这一点,张怡微诸多作品里弥漫着拂之不去的悲郁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近几年她旅居台湾求学,宝岛独特的历史经历、亚热带的风土人情与她有着某种天然的亲和性,她叙写台湾的大量非虚构性文字中同样洋溢着这一耐人寻味、令人陶醉的悲情愁绪。在《试验》和《细民盛宴》对家庭成员间复杂关系的精准描绘中,人们分明看到了心仪已久的张爱玲的流风遗韵,在新世纪的天空中得以传承,弹奏出一曲曲华彩的乐章。它将一切虚荣气十足的粉彩荡涤干净,留存下来的则是人世间赤裸的真相、复杂含糊的恩怨、暧昧不明的躁动、沦肌浃髓的悲凉,以及缓缓流淌的对未来的憧憬。在此,人生成了难解的僵局,绚烂的浪漫之花无法寄生其上,就像张爱玲《封锁》中的吕宗祺、吴翠远,两人一度沉溺于封闭的车厢内白日梦般的恋情中,一旦大上海那个盹打过之后,不近情理的梦也就随风而去。

梦醒时分，他们感到的只是悠悠无尽的惆怅，无法用一个愁字了得，而李商隐的诗句则提供了绝佳的佐证：“此情可等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继母，是在二伯家位于祁连山路的房子里。那一年我十七岁。已经差不多快要过完会有危险被可怕继母下手毒害的年纪，因而内心踏实得很，像逃脱山崖后吊桥方才收起，惊魂被时光毫不用情的翻转所悬置。我想起十岁时母亲曾对我说，古话说得好，“宁跟讨饭的妈，不跟当官的爸”，我就战战兢兢跟了母亲，从此不用害怕会被下毒、火钳烫、泼硫酸，不怕会被卖做童养媳……这一类事，一旦决定，往后就很难说清对不对，人生大部分的选择都是很偶然的，但任何一种选择之后，都需要绵长的意志力来克服浅滩暗礁的责难。选错了，也没什么，大部分人都选不对。

当时的我，因为太过年轻，还不太能理解男人的腼腆与怯懦。毕竟我父亲从头到尾都没有告诉我会在哪一天和她初初相遇。不然我也好稍作打扮，做些当孩子时必然会被原谅的逆反准备，显得不那么逆来顺受、困窘寒酸。因为无论是在什么年纪，女人的照面总是怀揣

鬼胎又意味深长，男人都不懂得这些，或者也永远不需要懂得。我自然不太喜欢这样贸然的出场，父亲却显然对此毫无知觉。

我父亲是个胆小怕负责任的男人，头大，肩窄，背驼，外观与内在基本吻合。我一直怀疑他小时候得不到父母的重视，成年后才会显得那么愚蠢怕事。他一贯如此，更何况恋爱期的父母，总是在孩子面前鬼祟得像个小偷。

父亲在电话里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只敢对我说：

“那个，你爷爷快不行了，家里人都到了，你要不然就来一下。”

他用将死之人来震慑我，以期搪塞那些他不敢启齿的重要的事。他显然知道怎样才能回避我的拒绝，知道怎样抛给我一个既定事实，无论我能否接到。他显然不需要我的意见，也不想面对我的意见。从头至尾，父亲甚至都没有足够的胆量叫一声我的名字。在漫长而悠远的青春期里，父亲有时叫我“这个”，有时叫我“那个”，我在他的口中就是一个远近的“区位”，而非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晃很多年过去。

奇妙的时间会令这些不大不小的眉眉角角渐失存在的意义。宏大的情绪包袱就像被豪雨掸去的发梢的灰尘。硬要记得它们，反倒会显得恶薄，不通世情。忘记它们，心怀又难以平复。我有时劝慰自己，不要总是那么神经质，人活着不可能强求事事顺心，有时却又被自己过剩的敏感与无能所激怒。

父亲亲手发明的这种非正式邀请，带有一点似真亦幻的骗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也是多年以来我凭借着对他绝望的评估所得到的生命经验。因而我最终决定让自己灰头土脸，周身笼罩着死亡的

疑云，什么准备也没有，就冷陌生头<sup>①</sup>地出现。借着死亡的荫头，我和那位素未谋面的妇人互相打量，未来的一切都不得不从这里突然起航，驶向黑黢黢未明的海洋。

这是和我们命运攸关的男人所做的一个挺糟糕的决定所造成。带有鲜明的、隶属他血肉的人格标识。正如俗话所言“烧成灰也认得出”的做派，父亲唯诺利己的性情，就像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品牌产品，值得我一再收验，从未失手。我不知道那位妇人是否知道这些严酷的事，又如何看待她与我们的未来。总之，她将在漫长的岁月中面对我与父亲难以言喻的撕裂，也将制造自己与他的新的撕裂。她又会如何来看待我们这一家子滑稽的场面。总之不由分说地，她的到来，成为了袁家悲喜长寿剧的转折，向着乌烟瘴气的我们，吹了一息清澈的凉风。

我记得那一天里，父亲从头到尾都看来十分怯场。他躲在不远处小心翼翼斟酌，任由我和那位陌生妇人在屋内展开精神厮杀。伴随着一桌麻将的吵闹声，他远观着，自然可以适时进退，以不变应万变。上海话管这种掉链子的行为叫作“拆滥污”，而我们这样不得不面对并容忍的无奈则叫作“揩屁股”。我和那位妇人也没真想要帮他“揩屁股”，且这种略带暧昧的抢夺，我断然不是所谓“爱人”的对手。然而眼下的局面对我们双方来说，却是满屋子的不合时宜。我甚至连在未来继母喝的白水里加盐巴的恶作剧都无从展开，只能大气地端坐着，佯装我早就准备好了来日方长。我在沉默中邀请她。

---

① 上海话，突然的意思。

她也在幽谷中欢迎我。心照不宣。

然而那时，我爷爷还没有真正咽气。我们的聚集，就是要共同宣布他将至未至的撒手。凡事我们都需要等着他先咽气后才得以缓缓启程。在死亡的大喧哗中，子女间的小恩仇不得不先化为表面的和平来服从大局。我和眼前那位妇人，甚至还要一起面对家族人刻意放光的贼眼睛，一见面就不得不同仇敌忾起来。我们要越坦然，他们才能越失望。人人都想成为安慰别人的人，同时避免被别人安慰。在这个庞大而冷漠的家族中，我没有朋友，也没有同行者。她显然也没有。

其实当时我挺想告诉她，若人生还有别的选择，何苦要跟我爸爸。关于这次突如其来的再婚，她是真的想好了吗？也许她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呢。

真惨。我心想。我实在替她难过。

她显然也有卸不掉的拘束，心思沉沉，满身月色，面孔像熨斗经过后地过分衬帖，带着热辣辣的湿气，硬要屏息架着一副矜持礼貌的面具。其实在我们袁家大可不必如此繁文缛节，没有一个人会珍惜她的优雅。袁家是一个尽可以耍无赖之处，从上到下几乎每个人都这么干过。不这么做反而会显得不那么真性情，显得看不起他们，刻意要与他们不同。这是他们万万不愿意接受的事，搏命也要讨回一个公道的。只可怜这一屋糟糕的人，暂时都只是我的家人，我费尽全力都难以与之区隔。她却还没过门，马上要过门，无知无觉进入这泥泞寒冷的泥沼地。

我估摸在那个时候，她才刚过四十岁。本来有大好的人生可以

重新书写。我是没得选，她却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破釜沉舟地放弃了，像患上恶性肌瘤的女患不得不放弃子宫。我猜这背后一定大有隐情，但碍于身份，我的好意与劝解不便表达，只得深埋于心，静静地，向她掷去疑惑又同情的目光。我看着她，脑海中忽然闪现一道灵感，我觉得我们俩未必能成为朋友，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也不会有足够的精力成为对方永恒的敌人。我们似有若无的亲缘关系，从此被父亲的一念所规定。由他的欲望、他的孤独，框下了我们三人从今往后日复一日的度过，像一场漫长的跋涉。在似真亦幻的光阴里，父亲曾软弱又温情。但归根结底还是软弱。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天虽是我第一次见她，却不是袁家人第一次见她。父亲作祟。而安排我们在那样的时地与场合相逢，仿佛也不是我父亲一个人的主意，他远远没有那么果决的能耐，全靠众人拾柴。这也就意味着，那天的那一场大戏，我不是观众。她也不是。然而我不知道这一切的缘起，她却是有备而来。她的沉静抖落心机。如鱼翔浅底。

她昭示她来了。向我。而我接过这种昭示，无奈的，像路过亡人。

※ ※ ※

我是自己一个人去二伯家奔丧的，我知道爷爷还没有死，没有死又马上要死，好像高中物理课展示斜坡上木块的分解力。当迫近的死亡带着不容分说的宿命驱使，多少是让人灰心的。为了能尽量去得晚一点，我还特地换了三辆公交车。从浦东到浦西，横穿大半个上海，脑袋里像在热腾腾地煲粥。

我对爷爷的感情，也就在这不断换乘的途中，一点一点被稀释。

那是我少年时第一次面对如此真切的死亡。大分离在我看来还是一个典雅的谜语。在我对这个世界刚刚开始建立起朦胧的认知之时，死亡是一件耳熟能详，又过于陌生的事。却因为我别有所思，令到这严酷的初次面对，多少有了一些薄情寡义的形容。这并非我的原意。但在那段寂寞的时光隧道里，我的原意从来无人问津。

听说，我爷爷是个好人。我相信这件事。

我三四岁的时候，他方从上海木材厂退休，在大自鸣钟摆咸菜摊头赚点外快。我母亲不喜欢大自鸣钟，说那是下等人聚居地，上海人说“下只脚”，就是将人的分类置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本质决定论中。其实，在如今的我看来，那不过是母亲躲避去婆家的借口。我曾经不明就里，以为母亲真的那么清高，对自己的下嫁耿耿于怀。二十年后，我才学会在这件事上与母亲将心比心，理解为人媳的两难，也理解男女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缠斗。于是童年时都由父亲独自抱我去看爷爷奶奶，他表面上没有怨言。我母亲则自顾自地在家里忙她喜欢的事，唱唱文明戏，或者看录像带里的《茜茜公主》。她很少问我关于爷爷奶奶的事。仿佛不知道我要去，也不知道我回来。她发自内心地不感兴趣，发自内心地不愿去记忆。

但每回爷爷看到我，都会热情地哄我坐在他的咸菜摊头上向客人打招呼，像只招财猫。他捧着我的手温，还留在我悠远的记忆里，是我与袁家长辈最亲近的接触。我想念他的笑容，只在稀少的瞬间里，我会觉得那些日子缓慢、美好到不真实的地步。那些年里，路过的行人都夸奖我聪明可爱，从小就懂得生意经，将来一定能当女经

理。我年纪小，不辨好坏，听到像在夸我的话，就跟着乐呵呵傻笑。我父亲也傻笑，庸常而憨厚。其实我们都是生意经上的智障。我们两个人加起来都及不上爷爷头脑敦敏的十分之一。且不要小看咸菜萝卜干这种打发退休时间的小营生。那几年里，爷爷通过这些小买卖赚了不少钱。这种小小的丰裕令他的退休生活安逸愉快。他心怀感激，不但感谢毛泽东，还感谢邓小平，作为长辈他比我们都要热爱生活，总是笑眯眯蹲在自家摊头上抽烟，见到谁都像圣诞老人似的慈祥。我爷爷是能干的男人，手巧心细，满脑子都是数字，目测就能知道木头尺寸、榫头大小，毛估估就懂得生姜大蒜的投资回报率。他是我们家族的顶梁柱，也仿佛一座神秘的高山，后辈里没有人真正超越过他。我奶奶也不及他思想深邃的万分之一，她满脑子只装得下我爷爷一人。爷爷一对花眼，眯缝着打探世界的角角落落，他浪漫而心细，神秘又精明。奶奶则是一对贼眼，看谁都像是要和我爷爷睡觉，吝啬而警惕。他们俩各有建树，这一辈子都过得挺提神。

爷爷那几年赚到的钱，后来陆陆续续被我三伯骗光。但那不是智商的问题，而是情感弱点。爷爷最疼三伯，没人知道为什么。三伯拿着钱，开起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最早的歌厅，却被我大伯母举报暗藏卖淫女。我大伯带着一伙警察毫不留情地查抄，三伯落跑躲债，至今都没出现。三伯有一个女儿，后来也再没有出现。我对她的印象极其模糊，只记得手臂上绿色的中队长标志。这中间到底发生了怎样不可饶恕的过节，我不清楚，我父亲也不清楚，我爷爷更不清楚。但这场家变唯一的意义，是令三伯在家族中成为了最有本事的人。尽管人人都有类似的企图，却只有他有真本领散尽了老人的棺材底，脱

颖而出，是一个传奇。对于他后来的消失，袁家老人们没有任何缠绵的思念。我奶奶每逢提到三伯，都恶狠狠说“迭只赤佬”。好似她不是赤佬他娘。我始终对上一代的亲子关系感到困惑，仿佛他们的爱是怪怪的，恨也是怪怪的。永不见面，居然也就不见了。我还记得我曾在那家黑黢黢的卡拉OK厅里唱过《妈妈的吻》，三伯说，我唱得好，能去比赛卡西欧大赛。大人们玩耍时，我就被他带到小包间，昏睡一觉。醒过来时，我用手指戳沙发下的地毯，顿时酒气扑鼻。听三伯说，“那些小姐们才不傻呢，只管拼命开酒，但转个身就把酒吐了。”三伯还说，“你知道这一间一间为什么到天亮还一直有人坐着吗？哈哈，后劲大。她们是站不起来，腿软。挣钱容易吗？哈哈哈。”

其实我没亲眼看到他有多坏，如今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他就这样静悄悄地消失了。在那个没有手机、网络、社保卡，没有监视器、行车记录仪的年代里，一个人的消失大概是容易的。他的绝情，加上时间的催化，越来越显得传奇。我记得他，却全是因为我怀念在那个幼小的年纪，我曾对世界充满好奇，记性也好得惊人。他们从未离开过我的记忆，即使他们隐匿得如此深邃。只是在那时，我曾为爷爷招过财，不知他临终前是否还记得。他将我放在摊头上顾菜，自己则跑去勾搭老太太的事，不知他临终前是否还记得。在我们这个巨大的家族中，每年总有更小的孩子不断诞生、不断比我更像圆滚滚的招财猫，我不知爷爷是否还记得我。父亲在电话里说到爷爷要死，那一瞬间我还是挺难过的。我的脑海中呼啸而过许多童年往事，即使没有什么事真的值得回忆，却还是感到万分心酸。但不知为何，

我隐隐觉得父亲是在骗我，总该有些比我爷爷要死更难以启齿的事端在等待着我。而我全部的不紧不慢，都赌上了十年以来对于父亲恒常的失信。他是一个早就在人格上破产的父亲，但凡稍微认真说点事，都显得别有用心。

且一如既往被我料中，我还是早到太多时间了。父亲总是希望我在一些糟糕的场合早早静候，丝毫不顾及我内心的拒斥。这种等待的空茫之感，令我从童年起就觉得自己是个挺不重要的人。当然我的确如此。

成年以后，我努力将这种不重要感变得好受一点，于是每次去家族盛宴的时间也拖延得越来越晚。这当然大大削减了我与那个同样在家族中挺不重要的父亲相处的宝贵时间。我想见他，又怕见他。每每见他，他身后都牵拖着无数牛鬼蛇神要兴冲冲地与我照面，使我终于只能快刀斩乱麻地搪塞，与他们切割，以期支撑着自己稀薄的尊严。当然我知道，在家族中，谈论尊严是可笑的事。然而要接受这种抉择所必然带来的愧疚，却陪伴了我不短的青春岁月。我低估了这种自毁的能量，绵延而强烈。那时的我，已经能够非常娴熟地分割两难的利弊，取其折磨较轻的一方。但我显然还没有强大到不相信命运这回事。

那日到达目的地时，整个小二房的空间已经被拥塞得水泄不通。我父亲围着围裙，满手湿腻腻的粉油，见到我，他显得尤其忙碌，像家族临时雇来的厨师，要做一场满汉全席来做寿。他瞅了我一眼，一点笑容都没有，也没有愁云。只是撂了锅铲，将双手在围裙上抹了一下，就拽着我，替我从房间里杀出一条血路，安排了一个来之不易的

座位(当然是那位陌生妇人的面前),又别头匆匆消失在家族的人海,一句话都没对我说。他满脸是汗,比我的远道而来还要风尘仆仆,转身空留一桌惮赫的麻将声给我,像是又一次的抛弃。

那一天,我们家的大部分亲属都到齐了,除了三伯。他们来自祖国各地,北京的、西安的、东莞的,像是要携手豁开阻挡在父辈与死亡之间的那道屏障,势如破竹,武侠片一样。喧闹是难免的,即使闭上眼睛,我都能听到谁咯痰、谁放屁、谁吃过韭菜、谁有严重的过敏性鼻炎。怀着深入骨髓的厌恶与失意,在家族里我总是显得过于沉默,像是心灵不健康的那种孩子。也许我真的是也不一定。

唯有爷爷床前的那桌麻将,将原本凄惨惨的氛围稀释了大半。死亡的延迟,与焦虑的旁观,倒像是儿女们要故意让他好走勿念,早日投胎。“噼噼啪,噼噼啪”,长城倒了又建,建了又倒。后来我也曾看过一些文雅人家的麻将,出现于一些师长家庭的午后,伴随着蛋花桂圆水铺蛋的香气。但在我心里,那不是真的麻将,而是一种对于话语匮乏的妥协,是情感难以沟通的折中。唯有我们家的那些麻将,粘连着菜香、粘连着死亡,才是真正的生计。所谓生计,无非是活着和死亡。是活着的人打给死去的人看的,是活人与亡人的勾兑。

围观的人中间,一半以上我并不认识。尤其是我父母分道扬镳后十二年中所出生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当他们长长短短出现在这间拥挤的屋子里,对我来说都很陌生,就像小区里的上蹿下跳的流浪猫狗。表面上自然也有可爱的天性,但大部分的时间里,我看着他们,都抱有戒心。此时我的二姑正在笃悠悠打绒线,一面偷看桌上人的牌局。她见到我,用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说:“哎哟乔乔来啦,这